

从伶仃洋畔到黄浦江边——杨殷与上海的两次交集

□徐明

杨殷（1892—1929），名典乐、夔礼，字孟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杨殷出生于广东香山；在广东，杨殷追随乡邻孙中山投身民族革命，继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牺牲于上海；在上海，他领导工人运动，参与中央工作，负责军事工作，最终用生命和鲜血实现了“甘愿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壮丽誓言。从伶仃洋畔到黄浦江边，杨殷短暂而英雄的一生，与上海有两次重要的交集：一是1924年年底至1925年年初，在上海出席中共四大，领导工人运动；二是1928年至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工作，直至被捕、遇害。这两次交集，不仅是杨殷革命生涯中极其重要的篇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并印证了中共建党早期上海与广东的密切联系和两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

一、1924—1925：出席中共四大与领导工人运动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淞沪铁路边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召开。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四大及时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理清了工作思路——既要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帮助孙中山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加快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由此，中共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把“组”改为“支部”，第一次确立了“三人以上得成立支部”的重要组织原则，使大批工农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队伍。中共四大的召开，不仅推动工农群众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走向高潮，也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小团体转变发展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监委委员的杨殷，出席了中共四大。陈延年在1925年1月5日致陈乔年、王一飞、罗亦农的信中写道：“第四次全国大会，粤区由谭平山及命葵二人代表出席。”“命葵”，即杨殷。李维汉回忆：“1925年1月，我在上海参加党的四大。记得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王荷波、邓中夏、彭述之、朱锦棠、杨殷、尹宽、陈潭秋、张太雷、李启汉、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等以及国际代表吴廷康。”担任四大会议记录员的郑超麟于1980年回忆，大会代表，已不能全记了，就记得的来说，可以列举以下诸人：湖南代表李维汉，湖北代表陈潭秋，山东代表尹宽，广东代表杨殷，欧洲代表周恩来，莫斯科代表彭述之，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安源代表朱锦棠，青年团代表张太雷……据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认定广东党组织出席中共四大的代表是谭平山、杨殷。

然而，根据1924年9月15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共四大会议通知，出席中共四大的全国各地方和海外党组织代表名额总计14个，包括：广州、上海、南京、济南、北京、唐山、天津、武汉、长沙、安源、旅俄组、旅法组各一名，以及青年团代表、特邀代表各一名。换言之，每个地方党组织的正式代表是一人。尽管郑超麟等会议亲历者的回忆都言之凿凿地指认杨殷为广东代表，不过目前国内党史学界有的认为，虽然杨殷出席了中共四大，但不是正式代表，广东党组织的正式代表是谭平山。

既然杨殷不是中共四大的正式代表，他又为何会身在上海，并出席大会呢？其实，杨殷到沪与当时上海的工人运动，尤其是在国内影响甚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罢工运动有着直接关联。

1924年，在共产党人向警予等人的领导下，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共产党

组织各界人士募捐接济失业工人。杨殷在广州组织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罢工后援会”，带领工人没收该公司在广州销售的200多箱、价值5万余元的香烟，拍卖后作为上海被开除工人的救济金。当年9月，受时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廖仲恺委派，杨殷从广州来到上海，代表廖向南洋烟草公司送交公函，帮助调解南洋烟厂罢工事件，却遭公司董事会拒绝。在调解过程中，杨殷被右派指使的人员毒打，身受重伤。

从时间上分析，中共中央发出会议通知、确定代表名额分配是1924年9月15日，此时，杨殷可能正在来上海的途中，或者已经来到上海。可见，杨殷来上海并非以参加中共四大为目的，而是受命调解和指导南洋烟厂的罢工运动。杨殷受伤后，便留在上海治病养伤，并参与中央和上海的部分工作。而在1925年1月26日，瞿秋白致信鲍罗廷通报大会情况时提到广东代表谭平山未准时参会的情况：“不过还是在等我和谭平山，并把国民革命问题推迟到16日讨论。”把杨殷和谭平山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可以推断，正是由于1月11日中共四大开幕时，广东党组织的正式代表谭平山未按时到会，因此，同样来自广东的杨殷便以非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

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杨殷向来自各地的代表介绍了广东的工人运动情况。在会议形成的11份决议案中，《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是篇幅最长的一份文件，系统阐述了中国职工运动的过去状况和现在趋势、职工运动与民族运动之关系，以及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组织问题等重要问题，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应当取得指导的地位”。中共四大闭幕后，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指派邓中夏、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等组成“党团”，组织领导广州、香港两地工人大罢工，声援上海。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标志，全国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推动民族革命运动走向胜利。因为资料的局限，我们无从得知杨殷报告的详细内容和会后回到广东开展工作的具体情况，但从中共四大对于工人运动的深入讨论、会议形成的相关决议，以及会议召开后沪粤两地工人运动的浩大声势，可以确信，杨殷关于广东工人运动的报告，对党的四大确立领导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一定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二、1928—1929：参与中央工作与领导军事斗争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7月，杨殷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为加强党的军事工作，中共六大决定恢复设立中共中央军事部，作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由杨殷任部长，委员有杨殷、周恩来、项英、颜昌颐、彭湃和关向应等人，不久又增加李硕勋、李超时、彭干臣为委员。从此，杨殷跻身中央领导层，并且担负起军事工作的领导责任。上海，成为杨殷参与中央工作、领导军事斗争的舞台。

从苏联回到上海后，杨殷于1929年1月正式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主任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部长。在上海工作期间，他与周恩来、蔡和森、苏兆征、李立三等人，经常一起研究部署各地的武装斗争和红军的领导工作，并曾到苏、鲁、皖等地实地领导武装斗争，为党的军事工作作出贡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被迫从城市工人运动转向武装斗争的重要关头，杨殷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8月24日下午，杨殷与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5位同志，在公共租界新闻路经远里1015号（今新闻路613弄12号）中央军委秘密办公地点开会，讨论江苏省委、军委的工作。因叛徒白鑫向敌人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租界巡捕抓捕。

当晚，中共中央获悉杨殷、彭湃等人被捕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周恩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同中央特科负责人一起研究营救方法。鉴于杨殷等人身份已经暴露，用

合法斗争方法营救已不可能，会议决定调动中央特科的全部力量，在敌人将杨殷等从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途中武装营救，并确定由陈赓亲自调度、指挥。因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成功。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杨殷毫不屈服。在明知生还无望的情况下，他仍和彭湃积极争取时间，向难友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道理，并通过秘密的关系，向中央报告被捕的情况，并大义凛然地指出：“我们已共同决定临死时的宣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的在这里作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他和战友们从血的教训中总结与敌人开展斗争的对策，希望中央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对于党内犯错误的同志，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1929年8月30日，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等战友高唱《国际歌》，呼喊口号，走向刑场。杨殷等人遇害后，周恩来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的报告，以极其悲愤的笔触，控诉了反动派屠杀革命领袖的血腥罪行，颂扬了4位烈士的崇高革命精神。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共建党早期中央局机关的所在地，也是中国革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杨殷与上海的两次交集和他在上海的活动足迹，与上海当时特殊的历史、政治、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上海不仅有租界，也有华界，还有越界筑路区，华洋交错，三界四方，客观上为以杨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和工作的便利。另一方面，上海和广东，都曾是中国近代先进思想的传播地、进步力量的发源地，两地都有开放多元、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对杨殷的研究和纪念，不仅有益于继承和发扬他的崇高革命精神，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沪粤两地关于中共创建早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深入研究，从中发现历史的内在关联和发展逻辑。

（作者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写本文时系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